张秀民先生和中国印刷史研究[1]

韩 琦

张秀民先生，字涤瞻，浙江嵊州市廿八都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在中国印刷史、版本目录学、中越关系史方面有精深的造诣。

先生四岁那年，在本村上小学，后转学崇仁镇高小，毕业后至嵊县中学，学习两年。后转学宁波四明中学(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浸礼会合办)，初次接触到美国老师。在校期间，对医学发生兴趣，遍览学校图书馆的卫生医学图书。高中即将毕业时，在国文课上读了黄炎培的"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记"，以为陈先生在南洋经商所得千万巨款，不为个人之安乐享受，在福建兴办学校，又在厦门岛上创办综合性的厦门大学，其大公无私之精神，实为难得。又见该校招生章程中有学生成绩优良者，可得陈嘉庚奖学金，海滨校舍，风景如画，乃不胜向往，1927年，赴上海招考处投考，得以录取。

在厦门大学期间，读的是文学院国学系，同班不过四五人，受业于周岸登（前清举人）、缪篆（章太炎之弟子）、余謇（前清举人）、郝立权（刘师培弟子）、李笠（孙诒让弟子）、朱桂曜及萧炳实等先生，当时选修的有《管子》、《老子》、《庄子》、《史记》、《文心雕龙》等科目。除必修国文、英文之外，还选修了法文、日文、德文、拉丁文等课。先生在校四年，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书库自由阅览，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读到一本英国人(T. H. Horne)写的目录学入门书*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London, 1814)，从而对西洋版本发生了浓厚兴趣。在大学学习期间，即开始编《宋版编年解题目录》，把见于著录的宋版书，依刻书年月先后为序，编为目录，详载每书之刻书序跋，以解决刻书之人与时间、地点问题。[2]先成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部分（北宋部分亦有草稿），后来发表的"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1936）、"宋光宗时代之刻书"（1937）两篇，即从目录中摘抄改编。

在校期间，发表了"评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及子部杂家类"和"目录学家凡例初稿"两篇论文，后者刊登在《厦大周刊》，对近代藏书家有关著作进行了梳理。又写了一篇"宋椠本与摇床本"，比较了宋版书与15世纪欧洲摇篮本的异同，寄往天津《国闻周报》，发表时该刊介绍此文作者是厦门大学教授，而先生当时不过是刚刚二十出头的学生。这是先生治印刷史的第一篇作品，对先生一生影响很大。1930-1931年，撰写了毕业论文《宋活字版考》[3]，

[1] 此文主要根据舅父张秀民先生自传、相关论著、手稿及其师友通信编写而成，论著目录由笔者编成。
[2] 目录有近代名僧太虚法师所写序文。
[3] 此文对活字印刷术早期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稿本尚存（未发表），有太虚法师评语"如理如量"。

获文学士学位。先生的学术志趣于青年时代就可见端倪。

因成绩优异，先生在厦门大学年年得奖学金。先生在国学和外语方面的深厚功底亦得之于这段时期的学习。当时大学毕业生虽寥寥无几，而求职却非常困难。李笠师对先生的前途极为关怀，把先生发表过的论文推荐给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先生。袁先生当即由馆方名义去信，谓新馆落成需人，望速来。先生未及行毕业礼，就乘海轮北上，从1931年至1971年退休，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达四十年之久。

在《宋活字版考》中，先生曾这样写道：

十九世纪初，英国目录学家Thorne (T.H.)有言曰：‘目录学中，更无重要于印刷术史者。’故其所著*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London, 1814）一书，论印刷术之起源及进步者独详(凡一百三十余面，p.144-277)。中又有论及中国木版印书之方法者数面。后此西方学者于此问题多有研究，惟考辨未周，且多谬误。及一九二五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arter (T. F.)博士《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一书(*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1925)出，后来居上，可谓集诸家之大成。以其搜罗中西材料，融会贯通，复得博学者为之助，故其成就，迥非前人所能及。顾其书亦不免疏略：如论宋代雕印大藏经(Tripitaka)仅及开宝五年（972）一藏，又未言雕于蜀中。而福州东禅寺、开元寺之两藏，浙江湖州之前思溪藏（1132,绍兴初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居住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捐捨家财，命工镂版于思溪圆觉禅院），后思溪藏（嘉熙淳祐间安吉州思溪资福禅寺所刊，1239）。又有端平二年（1234）碛砂延圣院版。每藏各五千余卷，如斯钜工，曾无一字道及。书中第二十二章述“中国活字版之发明”(p.159-168),仅据元王祯《农书》活字印书法,其论宋代活字版者（p.159-161），仅三面，惟将沈括《梦溪笔谈》记毕昇事，全译为英文而已，无所发挥。末又根据留庵《中国雕版源流考》者也。虽然，此未足为Carter氏病，我国人所论述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如《书林清话》卷八述宋以来活字板，则详于明而略于宋，其论宋代者仅三四百字耳。至《雕板源流考》考活字印书法，亦不过汇录王氏《农书》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原文，以充篇幅；且校雠不精，譌字甚夥。其述宋活字版，则亦节录《梦溪笔谈》及《天禄琳琅》百余字，溯而至于明清诸大藏书家，惟斤斤于宋板之口、线、鱼尾、行款字数，而于天水活字版，曾无一有系统之记载。即草草如《陔馀丛考》、《藏书纪事诗》之偶然论及，亦不数数覯。闻日本书贾英遵有《活字版目录》（未见原书），不知有我国宋活字版书之著录否？又德国Huelle

(Hermann) 对于中国活字版史及其在高丽之发达有十五面简要之叙述，不知其书论宋活字板果何如耶？夫印刷术史，在目录学上之地位既然重要，而宋代活字版，在世界印刷书史上又为开山鼻祖，不有论述，岂非阙典？此即本篇之所由作也。

可见先生一生与中国印刷史结缘与卡特(Carter)的专著有关。卡特著作的发表，无疑给国人一大刺激，引起了学者对印刷史的兴趣。1926年起向达先生的译文陆续在《图书馆学季刊》发表；同年10月，张荫麟先生在《学衡》杂志翻译了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的文章，实际上转译了卡特的成果[4]。1928年出版了刘麟生节译本，题名《中国印刷源流史》，被收入《汉译世界名著》。学术界对卡特书的反响，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初，对中国刻书史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有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1908)、叶德辉的《书林清话》(1911)，对中国雕版、活字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整理。后者还辑录了历代刻书、钞书、藏书等资料，影响很大。

先生进北平图书馆时，再读向达先生翻译的卡特著作数章，认为很有价值。有感于印刷术为我国的伟大发明，而此书反出外人之手，乃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印刷史。因此对印刷史资料特加留意，费了两年多时间翻阅了当时馆藏的全部宋版书约355种，成《北图藏宋版书经眼录》二册，《宋刻工名录》二冊，稿本现存。又翻阅了明嘉靖重抄《永乐大典》残本二百余册，数十年内把大书库数千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小说及日文、西文版本目录学书涉猎一过，成为中国印刷史研究广泛取用的资料之源。

袁同礼先生掌管图书馆时，事必躬亲，他不光让其发挥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应有职能，同时也把图书馆办成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网罗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向达、赵万里、谢国祯、孙楷弟、王重民、谭其骧等，集一时英才之盛。在这种浓厚的学术空气中，先生也受到切磋熏陶之益。

1931-1937年，先生主要在图书馆进行编目工作，是相对安静的时期，当时史学界有了较为稳定的环境，学术规范得以建立。七七事变之后，有感于亡国之痛，开始研究安南史。抗战胜利后至文革之前，才重操旧业，开始研究中国印刷史。

1952年10月，为配合中国印本书籍展览会，写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后被《文物参考资料》转载。此文发表后，深得学术界好评，于是应邀把此文加以扩充，写成《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著名史学家神田喜一郎见之，多有赞誉，1960年，由广山秀则译为日文出

[4] 戴闻达撰、张荫麟译：“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学衡》，58 期，1926 年 10 月，1-11 页。此文译自戴氏的“Coster's Chinese Ancestors”，载燕京华文学校所出的杂志 *The New Mandarin*. Vol.1, no.3 (June 1926)。

版。一时日本、苏联、美国刊物上多有书评介绍或报导。

由于早期实物的缺乏，因此对印刷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此书在详细考察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推定在7世纪唐贞观时期即已发明雕版印刷术，这是相当合理的结论，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同。对活字印刷的研究，则是该书用力最勤的部分之一。过去论活字印刷史的，先谈毕昇，接着便跳到元王祯，由王祯即至明华氏、安氏。此书举出杨古、马称德的活字印书，补足了王祯前后的空白。叙述金属活字时，同时论及铜板、锡板、印刷纸币。叙述套印后，也附述了蜡印的起源，均有独到的见解。以往关于泥活字印书的材料，只知道宋代毕昇发明，此后从未见有使用的记载，先生书中则蒐集资料，证明元代、清代也曾使用过泥活字，这样就把我国使用泥活字的记载衔接了起来。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对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历来的研究很少提及中国印刷术的影响问题，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只论述在西方的传播，对于中国印刷术传入朝鲜、日本，语焉不详，其它亚洲各国除伊朗外，更一字未题。先生此书则根据《李朝实录》等资料，说明朝鲜铜、铅活字在世界印刷史上的地位；并指出元末中国大批刻工在日本刻书，对日本印刷事业作出了贡献；还介绍了越南、琉球的古代刻书情况，又讨论中国天主教徒在菲律宾开创印书事业。这些成果弥补了卡特书的不足，屡为中外学者所引用。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只是中国印刷史的首尾两部分，其中主体，唐、五代以后至清末，仍有待深入研究。1961年左右，吴晗先生发起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先生应邀写了《活字印刷史话》，1963年初版，以后多次再版。后来先生又陆续发表了近三十篇文章，着重在活字印刷史的研究，特别在铜活字、泥活字、木活字的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挖掘，找出了许多新的史料，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71年退休返乡后，先生致力于《中国印刷史》的写作。由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达四十年之久，经眼的善本很多，掌握的资料丰富，因此具备写作这样一部全面性通史的优越条件。1984年全书书稿完成，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十多年精深研究的成果，终于得以面世。这是一部全面、详尽、有系统的关于中国印刷史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在这一专题领域中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也在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的研究中，增添了重要的篇章。此书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作了许多补充，“内容广泛，体大思精，洋洋五十万言，包罗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板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其他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版画、年画、报纸、纸币，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如纸、

墨等文房工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独到的见解。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一部最完备而有系统的综合之作。”[5]

《中国印刷史》论述唐、五代、辽、金、西夏、大理、元、明、清(附太平天国)各代印刷的概况，书中对于每朝印刷，先总论，次雕版刻书地域，各种官私刻本，刻书书坊，刻本特色，次论各朝活字本。又论述印本内容，略依四部为次，而稍变通之。藩府本为明代所特有，虽早有人注意，而很不全面；明代“制书”，宦官出资刻书，亦为历代所无；局刻本、私家校刻丛书，为清代特点，此书都加以论述。鸦片战争之后，西法石印、铅印输入中国，书中改正石印传入中国的年代，并叙述铸造中文铅字的曲折经过。关于明无锡华氏铜活字印书，徽派版画黄姓刻工，以前论述者世系颠倒错乱，书中均加以改正。此书还更多地考虑到了印刷术和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一部中国文化史的空前巨著。

《中国印刷史》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胡道静先生说：“尊撰的出版，使得率先发明造纸及印刷术的故乡，从此有了国人自写的专史，是文化史、技术史、国情教育上的一件辉煌大事，谨为吾公衷心祝贺。”[6]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说：“大著内容丰富详瞻，无疑是前无古人，亦恐后人难以逾越。”[7]美籍华人钱存训教授说：“先生在印刷史方面的贡献，领袖群伦，众所景仰。此次大著(指《中国印刷史》)获出版界颁奖，实至名归，不胜钦佩，谨再申贺。”[8] “大著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分析详明，见解独到，有如拙序所言，确属不虚。”[9]此外，国内外也有许多书评介绍。有人曾这样评论道：“早在1958年张秀民出版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当时日本的学者神田喜一郎的评价是一部‘非常诚恳真挚的好书。’……现在这部《中国印刷史》也同样当得起那样一句评语。因为其中绝对看不到哗众取宠的东西，也不会有敷衍了事的地方。读这样的书，好像对着知识的富矿，俯仰皆有所得，每一个字句，都有分量。”[10]

由于先生在中国印刷史研究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1987年，《中国印刷史》(校样)获首届中国印刷界的最高奖“毕昇奖”和“森泽信夫奖”，之后又分别获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史著作“荣誉奖”(1989)、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1990)。1997年，台湾印刷界还出版了豪华版《中国印刷史》（改名《中国印刷史论丛》）。

先生发表的有关中国印刷史方面的文章和专书，“不仅内容充实，数量可观，而分析详

[5] 钱存训：《中国印刷史》序。
[6] 胡道静致先生信，1989 年 10 月 22 日。
[7] 谭其骧致先生信，1990 年 5 月 3 日。
[8] 钱存训致先生信，1989 年 11 月 18 日。
[9] 钱存训致先生信，1990 年 4 月 30 日。
[10] 见《中华工商时报》1994 年 1 月 8 日苗棣文。

明，结构严谨，见解独到，尤为其文章的特色。他毕生从事这一专题的研究，写作勤奋，孜孜不倦。”[11]顾亭林曾论著书之难曰：“必前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先生的论著有当于斯义矣。梁启超先生云：“文物专史一须专门，二不可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先生的论著为学术界广为征引，即为“不朽价值”之明证。近年来，国内和欧美学者对中国印刷史的兴趣渐浓，已有许多论文和专著出版，大家更翘首盼望先生的《中国印刷史》修订版能尽早面世。

[11] 钱存训：《中国印刷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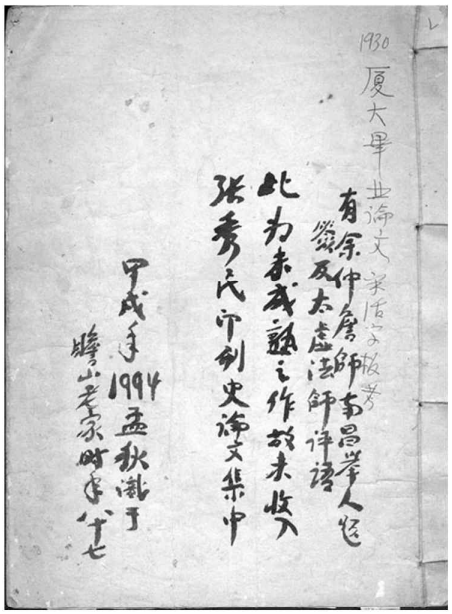


图1 张秀民先生毕业论文（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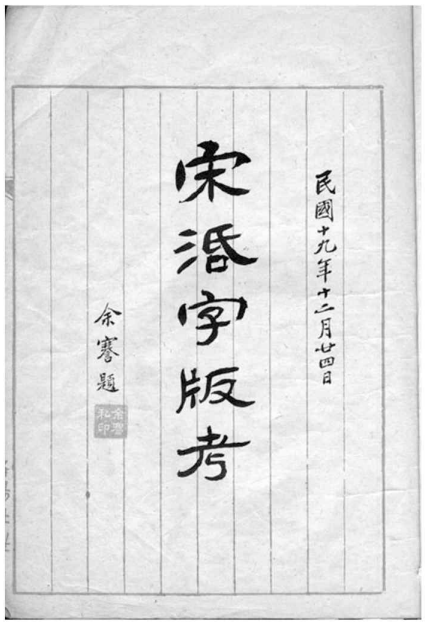


图2 张秀民先生毕业论文中余審题字（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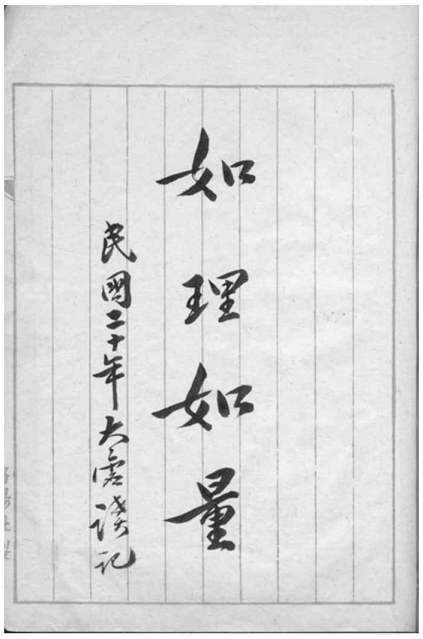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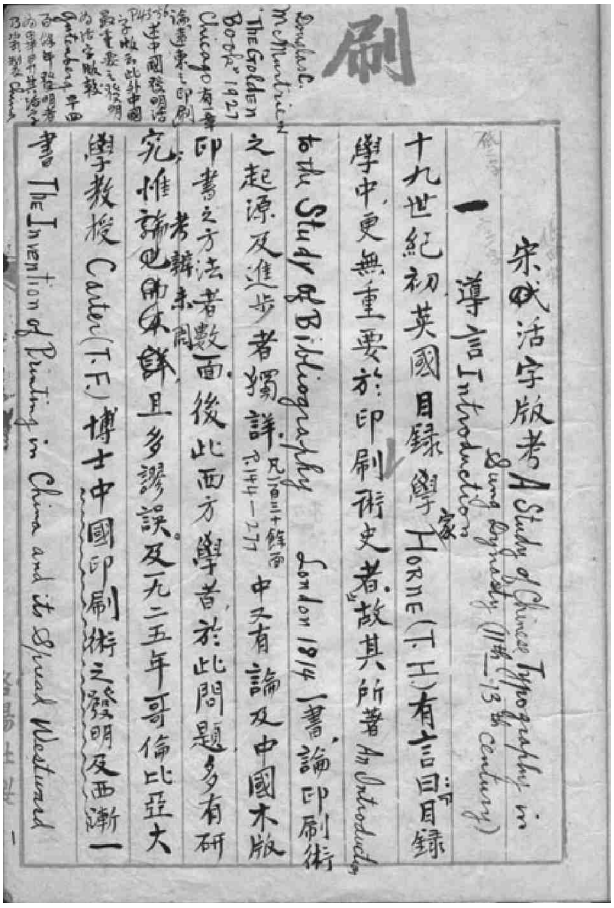


图3 张秀民先生毕业论文中太虚法师题字



图4 张秀民先生毕业论文中余審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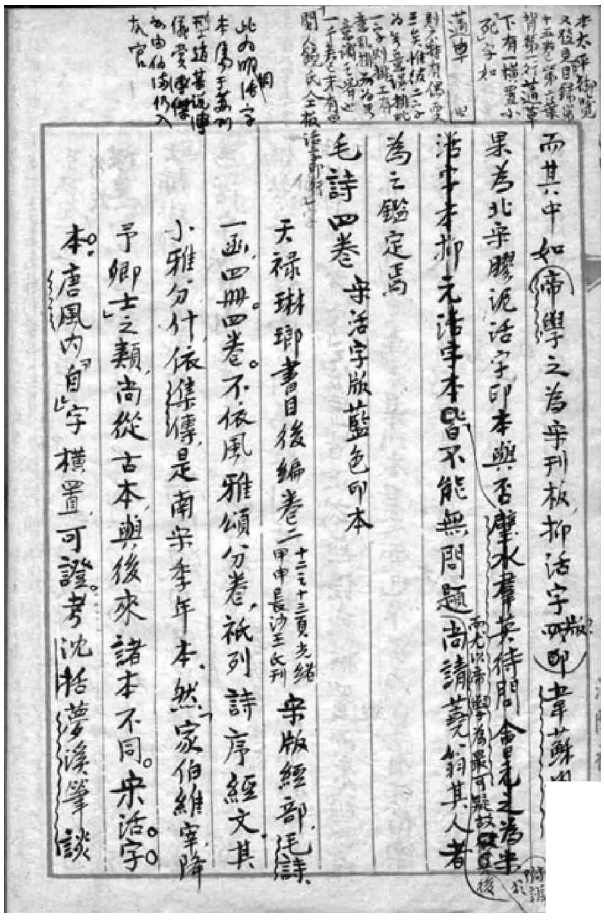


宋代活字版考 A Study of Chinese Typography in Sung Dynasty (11th–13th century)

一 導言 Introduction

十九世紀初英國目錄學家 Horne (T. H.) 有言曰：「目錄學中，更無重要於印刷術史者。」故其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London 1814 一書，論印刷術之起源及進步者獨詳。凡一百三十餘面 P.144–277 中又有論及中國木版印書之方法者數面。後此西方學者，於此問題多有研究，惟考辨未周，且多謬誤。及一九二五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Carter (T. F.) 博士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西漸一書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图 5　张秀民先生毕业论文（第一页）



而其中如帝學之為宋刊板，抑活字版，即韋蘇州果為北宋膠泥活字印本與否，肇水羣英待問，會元之為宋活字本，抑元活字本，皆不能無問題，尚請蕘翁其人者為之鑑定焉

毛詩四卷 宋活字版藍色印本

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卷二 十二之十三頁 光緒甲申長沙王氏刊 宋版經部毛詩一函四冊四卷。不依風雅頌分卷，祇列詩序經文，其小雅分什依集傳，是南宋季年本。然「家伯維宰降予卿士」之類，尚從古本，與後來諸本不同。宋活字本。唐風內「自」字橫置，可證。考沈括夢溪筆談

图 6　张秀民先生毕业论文（第十四页）